

趙縣文史資料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北省赵县委员会

赵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北省赵县委员会印

目 录

赵县联庄会	吴经义(1)
赵县抗日高小的回忆	尹振江(12)
赵县货币简史	
..... 常良计 邢海潮 周聚贤 曹澍宪 王庆珠	(18)
赵县当铺	曹澍宪 刘彦瑞 尹振江 郭大坂 (27)
仁和裕药铺的历史沿革	王恒太口述 殷英才整理(31)
铁窗里的八十天——陶冶同志回忆宁晋越狱	
..... 安秋霞 张双中整理	(33)
唐玄奘赵州求学轶事	白书囊(45)
抗日战争时期被誉为“小陕甘宁”的东晏头村	
..... 陈振海供稿 张双中整理	(47)
忆营救潘玉山经过及搞情报片断	
..... 邝铭汤供稿 张双中整理	(50)
英勇善战的革命烈士朱根法	吴经义(53)
奇兵夜捣特务班	吴经义(58)
民国时期县府的一次绑票	邢绵泽 刘彦瑞(68)
刘朝宗缴枪记	吴经义(69)
军民并肩解放前大章	吴经义 李恒禄(77)
解放前赵县的三大公害——妓院 赌场 烟馆	吴经义(81)
劝降郭炭块轶事	尹振江(90)
消灭二中队 活捉马振奎	
..... 吴经义 张庆辰 张波 张光辉	(94)

铁佛寺今昔	郝子襄(99)
赵县最早的银行	刘洁忱(101)
赵县旧式提水工具漫谈	周聚贤 常良计(102)
日伪时期赵县城关著名的工商业	周聚贤 常良计(104)
圣贤道的诈骗术	尹振江(106)
赵县京剧团的诞生与兴起	
.....	冯于农 侯全奎口述 赵凌霄整理(121)
历史上传说的“过朝廷”——清光绪皇帝回京途经赵州(现赵县)	
.....	邢震北供稿 张双申整理(128)

赵县联庄会

吴经义

1937年7月7日，日寇在芦沟桥发动了侵华战争后，于该年农历九月初九（即公历的10月12日）侵入我县，国民党军队弃阵溃逃，国民党政府离衡流窜，全县二百四十多个村庄，二十余万人民沦于日寇的血腥恐怖和无政府状态之中。各地土匪四起，国民党的败兵和社会上的地痞流氓、烟鬼恶徒等纷纷拉帮结伙，到处拦路抢劫，掠杀客商，砸明火、绑票、抢牲口，凭借武力，强行敲诈勒索，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日寇的屠杀，土匪的骚扰，闹的人心慌慌。在这种情况下各村的地主富户，眼看着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威胁，一个个更是惊恐不安。此刻，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各村的绅士、地主、富户和其它有产者，不断聚首相会，共谋对策。起初，他们为了保家护院防匪御盗结下互济互助的联盟，即一村盗匪行劫，各村都来应援，继而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联庄，并据此定名为“联庄会”。

赵县的联庄会始建于1937年的初冬（农历十月），此时在沟岸、西封斯、韩村、前大章、南龙化、大安等村相继成立，每个联庄会所联的村庄约在十几个，或者有几个，这些村庄就是会员村，入会人员全是有产者，除地主、富农外，还有一部分中农。他们的会长均系地主、豪绅、封建统治时期的军警头目和官僚政客。联庄会成立以后首先建立了自己的武装，这个武装组织有的定名为“保卫团”，有的定名为“自卫团”。团丁、枪支、弹药、粮饷均向各村摊派。有的联庄会规定每五十亩地出枪一支，有的规定每百亩地出团丁

一名、枪一支，有的是按地亩银子（旧社会政府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名称）摊派，每百两地亩银子出枪一支、团丁一员。团丁的来源由各村雇佣，枪支由各村筹划交联庄会总部，不交枪支的村庄或少交枪支的村庄必须按当时的枪价交足款额，由联庄会总部统一购买。

各项规定订出后，由联庄会会员村的富户代表推选出了他们的会长、副会长和管理团丁的团长，并设立了办事机构和“保卫团”、“自卫团”的团部。同时，又把各村雇佣的团丁和所摊派的枪支弹药集结起来，按照旧军队的组织形式，编为班、排。指定班、排长，把枪支发到每个团丁手里，并仿照旧军队的管理办法，由联庄会总部统一指挥和调遣，联庄会的会长均为兼管团丁的团长。

联庄会名称均以会址的所在地命名，但团丁的人数和枪支的配备，因所联村庄的多少和扩充势力的快慢，则各不相同，他们的概况是这样的：

沟岸联庄会会长张树兰，沟岸人，地主出身，“七·七”事变前毕业于保定讲武堂，曾在山西阎锡山部当过连长，其父为当地有名的绅士，张以其当过军官的身份，又仗着其父在地主、富农中的影响，四下联络，很快得到各村富户的支持。1937年初冬即把联庄会组织起来，各村的地主、富户都按照他们的规定雇团丁、纳枪款。一个几十个人的“自卫团”就在沟岸村成立了，并在两三个月内扩充为拥有四百多人，四百条枪的一支队伍。就在这个时候，郭炭块见张树兰的势力大，队伍扩充得又快，便把他的所谓“联庄会”投靠到张树兰那边了。张在其势力不断扩大的同时，为了保住自己的势力、地盘和生命财产，便秘密与赵县的汉奸县长薛胡叫（薛兴甫）、汉奸队长张汉三取得联系，互订和约，并向日伪汉奸献枪纳粮，从而得到了日寇、汉奸头目的应诺，以此便和日寇汉奸结为联盟，并按照日寇、汉奸的旨意，把“自卫团”改名为“良民自卫团”，至此，在日伪那里取得了合法地位。

西封斯联庄会会长焦文广、白假妮。焦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

军人，1937年冬在土匪蜂起，世道混乱之际，为了保护地富阶级的利益，焦、白二人（都是富户）则以他们两大家族拥有的六十多支钢枪为家底组织起联庄会，雇佣了几十名团丁，以旧军队的建制组织起来，定名为“自卫团”。人员和枪支扩充很快，自卫团建立不久即发展成一支拥有二百多名团丁、二百多条枪的武装队伍。焦文广、白假妮等人当时处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也设法沟通了伪县长薛胡叫，伪队长张汉三，同样以献枪纳粮为条件取得日伪的认可，并建立了互不干扰的和约。他们还按照日寇、汉奸头目的授意，把“自卫团”改名为“武装自卫团”。

韩村联庄会会长靳海云，北辛庄人，家庭是地主，另一名是王怀保，南柏舍村人，也是地主出身。这一带约有二、三十个村庄的豪绅、地富，于1937年冬，在盗匪不断行劫，社会秩序非常混乱的情况下，联合起来组织了韩村这个联庄，并很快凑起了四、五十条枪和五、六十人，按旧军队的建制，组成了“自卫团”。1938年农历正月，王家庄的大地主李树三也投身入伙，并掌握实权。这个联庄会的头目们，通过史家庄×××与汉奸县长薛胡叫和伪军队长张汉三秘密取得联系，随后薛、张两个汉奸把李树三、靳海云、刘树仁等秘密接到县城，李、靳、刘进城时，还带了几支手枪，在会面时奉献给薛、张两个汉奸，并趁此机会订立了互不冲突和向日、伪纳粮、纳款的和约，此后，还按照汉奸头目的授意，把“自卫团”改名“良民自卫团”。后来这个联庄会的“良民自卫团”扩充到四百多人、四百多条枪。

前大章联庄会会长张老振，前大章人，另一名叫马老士，后大章人，这两个人均系本村的富户，这一带大约有三十多个村庄于1937年初冬组织了个联庄会，同时凑起了一百多条枪，雇佣了一百多名团丁，按旧军队的建制，组成“自卫团”，分成两个队，驻扎在前大章和乡官两村，前大章为总部，他们的旗号是防匪防盗，保家护院，维持社会安定。在各项事宜安排妥当后，他们也想方法与

汉奸县长薛胡叫、汉奸队长张汉三秘密取得了联系，薛、张向他们提出了要枪要款的条件，张老振、马老士等都满口答应，并由薛、张定好日期，限他们按时到县城会面，到时在城北门有人等候，接应入城，张老振、马老士等人按着薛、张两个汉奸指定的日期，携带着几支手枪和几支大枪准时赶到县城，在议和时，把枪交给了薛、张，密订了和约后，张老振、马老士还答应不断给日伪交粮纳款，张、马回到前大章后也是按照日、伪头目的授意，把“自卫团”改为“良民自卫团”。

南龙化联庄会会长樊毅然，南龙化村人，“七·七”事变前在国民党的警察组织里当过管辖三十个人的小头目。“七·七”事变那年，他趁国民党军政人员南逃之机，把三十条枪暗藏起来。日寇入侵赵县以后，1937年初冬，圪塔头的绅士、当过保安团长的李津良，看到土匪四起，世面混乱，已经危及到他们那些地主老财生命财产的安全，便与樊毅然合谋联络了临近几十个村庄的地主、富户，在南龙化成立了联庄会，樊毅然把暗藏的三十支枪拿了出来，李津良则以他在城东北一带富有者当中的影响，让各村地主、富户凑枪、凑款，雇佣团丁，很快集结了五、六十人，同样是旧军队建制，组织起了一班武装人员，定名为“武装自卫团”，打着“维持社会秩序”的旗号，实际是为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招兵买马，很快扩充为拥有二百多名团丁，二百多条枪的一支看家护院的队伍。樊毅然、李津良和其它联庄会的头目一样，通过他们的亲朋好友，往日的关系，与汉奸县长薛胡叫、汉奸队长张汉三拉上了关系，以枪款相送，使他们的联庄会在日伪那里也标名立册，并互订不相冲突的和约，之后，把“武装自卫团”按着汉奸头头的旨意改名为“良民武装自卫团”。

除上述联庄会外，在城东的大安村，城南的封家铺等都联合了周围的几十个村庄，于1937年初冬，成立了联庄会，各自都组织了“自卫团”。并且都拥有团丁四、五十人，枪四、五十支，与其它联庄

会一样，开始时都是旨在看家护院，后来所走的道路则各不相同。

这些联庄会以及他们的武装自卫团均系 1937 年的初冬筹建而成的，并联结了城南、城北、城东、城西的绝大部分村庄，但他们是各霸一方，自立为政，不过，在老百姓中的口号都是“打土匪、保家乡、保护大伙的生命财产”。当时均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和斗争目标。各联庄会所辖的地盘是他们入会的村庄，集结在总部所在村的武装团丁，均使用“现代武器”（1937 年时的说法），即步枪、马枪、冲锋式、驳壳、橛子等。有的自卫团还有轻机枪。这些武装力量约定，哪个村庄遭劫，就到哪里去打援。此外，各入会的村庄，在本村也指派了各自的负责人，按联庄会总部的意见和本村的情况，建立了户与户联合防匪防盗的组织，规定：凡是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家都要自带武器，即土枪、鸟枪、决枪等。把所有的胡同架上门板，有的村在街道上还搭上过街桥，做为联防的通道，并在各村的一处高房上盖起打更楼，把参与者编成班，每天夜晚轮流巡更，发现盗匪，鸣枪为号，全体出动，抵御匪患。联庄会所辖的武装自卫团，也闻讯出援。这样以来，对富有者来说，确实起到了保护作用。

随着联庄会的不断扩大，兵丁和枪支的不断增多，办事机构和行使权利的职能也不断的转化，以保家护院，保命保财为宗旨则远远不能满足掌权者的政治渴求。当时在联庄会总部，除了征收团丁的粮、枪、弹款和办公的费用外，又开始了承办民事纠纷的调处，打架斗殴的管理，颁布禁赌、禁烟（卖吸毒品）的规定，还设立了临时的监狱和公堂，受理刑事案件，名虽如此，但实际上则是他们认为盗匪的人，或是某刑事案件的嫌疑者以及各村豪绅地富告发的人，即派兵丁抓捕起来，进行审判，并自授了生杀予夺之权。当时，这些联庄会都处死过不少人，其中有土匪，有的则是联庄会某领导人或各村豪富的仇人，均冠以罪名，苦打成招之后处死，有的是过往行人或客商，劫去财物，酷刑拷打，问成个汉奸或其它罪名，最后判断，由此，联庄会已不是初建时那个看家队了。而是已经按着掌

权者的政治观点和阶级立场，向着既掌兵权又掌政权的方向走开了，就那时的情况而言，联庄会这由富者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乡间团体，已经形成了一个半军半政的地方军政机关。颇有与“七·七”事变前国民党县政府派驻各区的区公所和巡警局的架势。联庄会的会长也好象那时的区官和警官。

这些联庄会的掌权者，由于出身于封建统治时期的军警头目、豪绅、地富，且又与日寇汉奸密定了合约。由此可见，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利益的忠实维护者，以下面的几个事件来看，就会充分而明确地把实质说明。

联庄会的建立确实对保护地主富农大老财们的生命财产起了很大作用，小股土匪不敢触动他们，对大帮的土匪如号称“天下第一军”的土匪头子李小贞，他们则设法联合，韩村联庄会的头目李树三，靳海云、刘树仁等就亲赴宁晋县米家庄与李小贞密订了互不干扰，互不冲突，互相援助的盟约，至此，防匪防盗的联庄会倒是与土匪结成了联盟。1937年冬天，共产党员马玉堂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在赵县城西南一带打游击，发动群众进行抗日，组织扩大抗日武装队伍，在进驻西封斯村时，设在这个村的联庄会的头目焦文广，依靠西封斯的寨墙，亲自指挥他那二百多名团丁，以猛烈的火力阻击，使这支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抗日军队，没能进驻该村，旨在到这几个村进行抗日宣传的计划也就被破坏了。

1937年12月，抗日义勇军在赵县城东北一带活动时，曾驻防于赵县南庄村，刚刚住下，即被南龙化联庄会得知，这个联庄会的头子樊毅然很快把这个情况告诉附近的联庄会，并纠集了藁城县刘海庄联庄会的头子张会山，藁城县梅花镇联庄会的头子曹万祥，前大章联庄会的头子张老振等，共集结了一千多名团丁，樊毅然任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南庄村西北约五华里处的董庄村。樊毅然亲自指挥战斗打得非常凶狠，且兵多火力强，抗日义勇军因寡众悬殊，被迫撤退到南庄的一座最高房所里，这座房子从街上看去约有三

丈多高，没有重武器是难以攻下的，在这个房所里的五六十名抗日义勇军的战士，居高临下，坚持了三天三夜，打的弹尽粮绝，最后连口凉水也喝不上，仍坚持用砖瓦石块还击联庄会团丁的进攻。此间，曾有三十多名战士组织了十多个突围小组，冒着生命的危险夜间秘密潜出房所，携带信件，请求援兵，樊毅然、曹万祥、张会山老奸巨滑，布置的网哨严密，求援的战士一个个被樊毅然的部下俘获了，三十余名被联庄会生俘的抗日义勇军战士都被绑到董庄联庄会的指挥部，樊、曹、张等人当即严刑拷问，结果，有的被火烧水烫，有的被掏心挖肝，有的被活活埋葬，有的被大刀砍头，有的被乱刀扎死，有的被活活勒死，手段之狠毒，刑法之残酷可说是达到了极点，被俘的抗日义勇军战士在樊毅然的手下无一幸免，至今白骨还具具埋葬在董庄的村西、村北荒地里。

送信求援的战士终于突出了重围，请求援兵的计划实现了，战士把马玉堂的求援信送给了土匪头子李小贞（后来投降日寇，充当了汉奸，任石德铁路护路司令）。因马玉堂与李小贞旧日有交情，是朋友，李小贞又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头子，与地主豪绅的联庄会是冤家对头，这点我们可以利用，李小贞又念江湖义气，遂发兵一个团，由张鸿昌率领到南庄打退了樊毅然等所指挥的联庄会，救出了被围困在南庄的抗日义勇军战士。这次战斗，纯属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联庄会的头目们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部队的一次毁灭性摧残，也是我们共产党的党员和抗日战士在赵县境内遭到的第一次集中大屠杀。

1937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九，马玉堂率领的抗日义勇军活跃在赵县、栾城边界一带村庄，在栾城南高村驻防时，赵县韩村李树三、靳海云的联庄会，前大章张老振的联庄会、栾城县南高村一带的联庄会的头目各率领他们的团丁共有三百多人，并勾结了石门（石家庄）、栾城、藁城、赵县三个县的日本鬼子兵约三百人合谋夹袭南高，妄图一举全歼抗日义勇军，并由藁城县梅花镇联庄会头子

曹万祥等统辖各联庄的团丁，同时，还指派赵县韩村的联庄会率领他们的全部团丁在赵县史家庄一带村庄设下埋伏，准备伏击向东转移的抗日义勇军。之后，在日本鬼子的统一指挥下，把南高村重重包围起来，日寇和联庄会的头目们满以为这样就可以达到彻底消灭义勇军的目的了。在这天的早晨即向驻南高村的抗日义勇军发起了全面进攻。日寇和联庄会的头目们的这个计划，早被打入联庄会团丁内部的共产党员得知，并很快将这一极为重要的情报连同日本鬼子和联庄会的兵力、火力及其它情况一并向马玉堂等领导同志报告了个清清楚楚。据此，抗日义勇军已作好了一切准备。因此在这次战斗中尽管日本鬼子和联庄会的头目们把所有的轻重武器都施展了出来，但其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被抗日义勇军所击败。战斗进行到傍晚，日寇又调藁城的一百多名鬼子兵来打增援，最后一次疯狂地捕杀，日寇的鬼子兵和联庄会的团丁又遭惨重伤亡，大败而逃，至此，马玉堂所领导的抗日义勇军突出了重围，安全地转移到其它地区去了，日本鬼子、联庄会的头目们梦想全部消灭抗日义勇军的计划也彻底破产了，而且抗日义勇军转移时，没有路过史家庄。因此，联庄会设下的埋伏也成了寒风刺骨中的空练兵。

1938年的春天，赵县的联庄会已经不是原来的看家护院的队伍了，而是转为密联日寇汉奸，明与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抗日救国组织及武装力量进行摩擦的对头兵，并不断地袭击共产党的组织和抗日力量。就在联庄会各自称霸一方，自立为王的同时，八路军的一二九师三八五旅的东进纵队，进驻了赵、藁、栾、晋、宁等县。八路军大部队的到来，一方面宣传和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组织抗日群众组织，一方面对联庄会发动了政治攻势，向联庄会的官兵们宣传共产党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并揭露了联庄会所走的道路是反对共产党、破坏抗日与酷害中国人的罪恶道路，在南庄杀死三十多名共产党员和战士就是例证，这些人都是穷苦出身，这一清楚的

事实使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地明白了联庄会不是为了大伙办事的，而是为他们少数的几个地主老财出力的。在其下层多是受雇的穷人，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为他们卖命了，同时也就没人再去参加他们的组织了，但由于联庄会上层领导人的阶级本性决定，坚持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的立场仍不改变。因此，在八路军驻我县不久，为了扫除抗日道路上的绊脚石，保卫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即以政治的和武力的手段把南龙化樊毅然、藁城县梅花镇曹万祥的联庄会及该县刘海庄、张会山联庄会全部收编了，其中大部分人员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少数人员遣散回家为农，樊毅然、曹万祥、张会山拒不归顺，且又是罪大恶极的屠杀共产党人的罪魁祸首，并企图投降日寇。因此，均处以死刑，当众枪决，前大章联庄会的会长和大安联庄会的负责人不属于樊毅然一类的人物，允其回家为农，他们的团丁是受雇的穷苦农民，绝大多数人参加了八路军，少数回家为农。至此，赵县城东北南龙化和前大章的两个联庄会彻底消亡了。

1938年的春天，张树兰、李树三、靳海云、焦文广、郭炭块等所组织的联庄会，除了与日寇汉奸经常联系，在日寇那里取得合法地位外，仍是按着他们的意图活动在城南、城西、城北的一带村庄。在这个时期，曾毕业于国民党军官学校，后又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军官的侯如庸组织了一支打着抗日旗号，暗地里进行反共活动的武装部队，这个部队的名称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十三支队”（在赵县常说的十三支队就是这支队伍）。张树兰也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而且张树兰的父亲又是城西一带有名的绅士，家庭也都是大财主，侯如庸与张树兰父子两辈都相识，私人关系也很好，侯如庸为扩大武装力量，便派其政治部主任×××亲赴张树兰家中，进行联系，争取受编，因双方立场完全一致，张树兰很快接受了收编的意见。随后，侯如庸即委任张树兰为第十三支队第八团团长。在此期间，李树三、靳海云的联庄会，郭炭块、焦文广的联庄会，他

们也和张树兰一样，受编于侯如庸的十三支队。联庄会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后来十三支队改编为“冀察战区游击挺进第四纵队”，侯如庸任司令。司令部设在元氏县杨家岭，后迁入台城，纵队建制为五个支队。（因我县各地的群众都习惯的称他们十三支队为代号）。就在这年的四、五月间，李树三伙同刘树仁（北辛庄）、刘宝琦（大马村）、靳海云（北辛庄）等与侯如庸取得联系，李树三还讨了个赵县县长的头衔，县政府设在韩村。之后，李树三又兼任五支队第十团团长的职务，张向阳任第九团团长的职务（张向阳系张树兰的同乡同族），郭炭块被委任为特务团团长，武装力量发展到一千多人，从此，联庄会在赵县境内就消影灭迹了。

联庄会变成十三支队后，盘踞称雄，遭害百姓，为所欲为。暗地里进行反共活动，经常与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挑起事端，发生摩擦，打击摧残抗日组织的基层领导人，依仗势力，强行解散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对八路军断粮，断款，拒绝供应。于1939年，十三支队为了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高潮，暗地伙同他们的盟军——民军，公开打出了反共的旗子，到处破坏共产党和党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明枪实弹的袭击八路军。共产党、八路军为了有效地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以党所领导的冀中抗日队伍，对十三支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这次战斗叫“打叛军”，把盘踞在赵县境内的十三支队很快消灭了大部。少数人员逃跑到元氏台城。总部的人员及溃败而来的官兵也在1940年1月12日被我军打得土崩瓦解，溃不成军，所剩残部潜入山西境内，南逃而去。

十三支队虽遭受惨痛的失败，但反共的心未死。在逃离台城后，又派郭炭块率领一个大队的人马，潜回赵县，公开投降日寇，充任汉奸队——伪警备队的大队长，联大队长，到处杀人放火敲诈奸淫，肆无忌惮地捕杀共产党的党员和抗日组织的领导人，破坏抗日组织和抗日工作。在郭投降日寇，充当大队长后，被打散逃亡的

联庄会的领导人和坚持反共立场的一些顽固分子，又纷纷投靠在郭炭块部下，充当汉奸、特务，依靠日寇的势力，围剿共产党八路军。焦文广这时也充当了汉奸队长，捞了个小头目，驻防于西湘洋，结果被八路军打的人枪殆尽，他见势不妙，便弃职回家为农了。郭炭块虽越来越嚣张，但最后还是被八路军打败潜逃，落网后，被处以死刑。李树三等人仍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最后终于落入人民的法网，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综上所述，这就是赵县联庄会的兴起与灭亡，这就是赵县联庄会上层人物的最后结局，这也就是赵县联庄会的历史。

赵县抗日高小的回忆

尹振江

赵县抗日高小，筹建于一九四四年春天，由两个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干部县长郭灿章、民政科长（当时也管司法、教育）刘秋和商议组建。最初负责筹建、管理、招生、上课的是南庄的李旭生（原名李焕堂）。李毕业于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化知识丰富在政治理论方面有一定造诣。一九四四年春，郭县长、刘科长住大东平，两位领导人在长期地、艰苦地抗战实践中，亲身体会到：自“七七事变”开始的六、七年间，由于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根据地逐渐缩小，抗战工作受到严重挫折，农村小学教育也随之受到很大影响，少年儿童、青年失学，文盲增多，知识水平下降，长此下去，赵县抗战阵营定会缺乏有知识、有文化的接班人。因此，不管困难有多大，在解放区境内必须迅速解决这个问题。二人商定后将南庄李旭生请到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大东平（当时县政府是游击性的），郭灿章、刘秋和、李旭生三人共同商定了解放区建立抗日高小的一切事宜。商议后确定：李旭生负责筹建，县政府通知各区政府及抗日团体等各机关单位发动并介绍学员入校。抗日高小校址最初筹建设在大东平米家祠庙，时间不长即招收学生近二十名。为使抗日高小学生能安全学习，一九四四年初夏，县长郭灿章指示把抗高迁移到南庄，校址设在原小学校（三官庙）院内，小学迁移到村南吕祖庙院内。小学师生亲自动手把吕洞宾从宝座上打翻在地，送进历史垃圾堆，把吕祖庙改建成小学课堂。

抗高迁到南庄招收学生十余名，总共达到四十人。计有四德魏

云英(女)、河西寨孙怀凤(女)、秀才营李志信、大东平李广琦、米俊录、曹庄刘保群、常信营李献戊、李献录、李如新、李东来、李庆年、李根栓、李凤林、郭振英、张明太、范庄刘银奎、徐家寨徐光录、南庄李增运(化名李冰)、李庆宾、小东平杨京刚、西朱家庄朱振雪(女)、贤门楼高志平、高明法、戚明昌、高广才、姚杜庄杜振声、杜光履、杜振法、谢庄殷长领、殷计全、王同伟、东晏头陈守礼、陈秀珍(女)、西白庄张义修、张义兴、石家庄李志英(女)、六市庄杜花凤(女)、北冯张秀珍(女),同时,城南解放区在曹拔萃、贾子乔、曹铭箴、陈光葵等负责人的主持下也组建了杨村抗高和丁村抗高。由于城东抗高在南庄居住学习的时间较长,人们都习惯地称南庄抗高。

南庄东边十二华里有大安敌人据点,南边十华里有贤门楼据点,西边二十华里有前大章据点,北边十五华里有藁城贾市庄据点(藁城赵县边界)。从地形上看,南庄抗高处在敌人四面据点包围之中,当时还是敌强我弱,随时都可能受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所以,抗高也采取游击式学习,敌人不出来扫荡就在校内学习,敌人出来扫荡就转移到树林或它村学习。

抗高的宗旨是明确的,校名就叫抗日高小,入校学习就等于参加了抗日战争。所以,当时敢于报名参加抗高的,都是有民族气节、爱国思想、拥护共产党、八路军、敢于和日寇、伪军斗争而不怕流血牺牲的青少年积极分子。当时是抗日时期,解放区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口号是: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所以,当时招收学生不分阶级,有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也有地主。从成份上看是复杂一些。但从政治思想上来说,这批学生是思想纯洁、意志坚定的。

当时环境残酷,师资缺乏,学校编制是简而精。起初只李旭生一人,上课、选编教材、管理学生等都是他一人承担。随着学生的增多,教务的繁忙,学校迁到南庄后,八、九月份调张景禹(常信营人)到抗高担任校长,二人合作管理和教学。